

林纾： 本来是先驱，却落个“坏名声”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新文化运动中，林纾的名声不太好。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描述中，他是一个“老顽固”。的确，他与高举程朱理学、先秦两汉古文以及唐宋八大家旗帜的桐城派作家惺惺相惜。

但这个人又是公认的翻译外国小说第一人，是他第一次将西方人文观念以最活泼的形式引入中国。在钱钟书眼里，林纾翻译的小说，不仅不受“古文”的限制，甚至忽视了中国语文的习俗。

身为这样一个两面派，林纾是不是有些精神分裂？但后世有人看得明白：其实林纾本质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根据史料记载，在新文化运动闹得轰轰烈烈的1917年，真正用新文学、白话文完成的优秀作品很少。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政治散文，鼓吹新思想、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但其表达方式差不多都是文言文。

陈独秀等人口中的“老顽固”林纾，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是文学改革者。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林纾用白居易讽喻诗手法写了《閩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多抨击时弊，文学表现手法上多有对民间文学因素的汲取。当白话兴盛，人人唾弃古文之时，林纾也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上开辟专栏，作“白话道情”，风行一时。在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林纾从没有刻意反对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

但是林纾在身体力行推行白话文的同时，没有像陈独秀等人那样将古文一棒子打死，也没有像钱玄同那样大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林纾传统文化功底深厚，从



【林纾】

扫码看视频——对话林纾



记者：林大师，放暑假了，您给孩子们推荐本假期读物吧。

林纾：林译小说是您居家旅行、上课放假、泡妞逼逼必备良品，不要998，不要98，只要9块8，欧文、雨果、莎士比亚、狄更斯、哈葛德、小仲马带回家。

小痴迷读书，他的文章深得桐城派领袖赏识。当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发表后，林纾加入讨论，表示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不要刻意将文言文彻底消灭掉。他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汲取古典文学营养，就不能写好白话文。

这很像梅光迪、任鸿隽等人提倡的：大多数民众应该使用白话文，但读书人在尽量用白话文写作的同时，要为文言文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使中国文化这一重要载体不至于失传。

他曾致信陈独秀：文学改良这种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内学术界各方面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们这些倡导者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我们既然已经打出文学改革的大旗，当然不会再退缩，但是我们也决不敢以我们的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陈独秀显然不这样认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意思是，这事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林纾说：“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却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虽然我说不清为什么，但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马班韩柳也不应该被废。”然而，这个“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坦诚态度，却被胡适、陈独秀等人揪住小辫子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荒唐的主张。

很多事情，要留待历史和时间来辨其是非。对林纾来说，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的主张也更被后人认可，林纾最后只能落了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坏名声”。

几句话， 记住这些人物

本报记者 陈玮 整理

易白沙：新文化运动学者。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称得上是言辞激烈的反孔檄文。他率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其自由”。

高一涵：新文化运动主力军之一。1916年7月从日本留学回国，与李大同同办《晨报》，经常为《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是当时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扮演着思想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角色，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

顾颉刚：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

罗家伦：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南京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罗家伦所提出。

康白情：五四运动的弄潮儿。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康白情及“新潮社”成员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于同年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同年创办《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康白情负责编印。

毛子水：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毛子水参与发起创办《新潮》，并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论著，成为当时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谌志笃：五四学生运动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谌志笃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一次讲演中，为激励国人，谌志笃毅然断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盟书。



报纸没看够？想和记者、小编直接对话？快加入“新文化人读者交流群”437864601，我们一起侃文化！

电话：96706056
邮箱：qlwbwenhuaren@163.com

“打倒孔家店”真有人说过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今天，人们未必记得住新文化运动中种种蓬勃的思潮，却一定还记得那句响当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今天，我们重新回顾新文化运动时，倒要问一句，到底是谁提出了“打倒孔家店”？

第一个喊冤的应该是胡适。1921年，胡适应邀为老友吴虞的一本新书作序。该怎样吹捧一下自己朋友的新书呢？胡适思来想去，忽想起新文化运动中大伙儿一块儿批判过孔子思想，特别是吴虞认为孔子倡导的忠孝社会强化了国家结构，这观点立意很新，分析独到。于是，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正是“只手打孔家店”这几个字，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接近“打倒孔家店”的证据原文。也许这里会有人问，怎么原文里只有“打孔家店”，而没有那个关键的“倒”字啊？

后来有评论者认为，一个“倒”字存否，已表现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当年那些倡导文字语言、思想文化革新的学者只是想批判一下传统文化，让国民出来透透气，所谓“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但“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孔子】

不管当时如何，即使被说“打孔家店”的吴虞先生本人也不乐意。北师大教授李怡考证说，吴虞看到后，立刻表示不能接受，胡适本人也再无批孔言论。

那么，“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其他新文化运动旗手所说？历史学家翻遍了资料，也没能找到证据。北师大已故教授童庆炳曾分析，胡适六七岁进私塾，到了八岁时，已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后来，他到了美国，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依旧是中国古代哲学。因为他最熟悉和最了解的是中国古代四

书五经，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童庆炳说。

鲁迅呢，从史料中也没有查出他说过“打倒孔家店”的记载。

至于陈独秀，他1937年刚一出狱，便在《东方杂志》34卷发表《孔子与中国》，明确表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一向顺历史风声而动的郭沫若，则对孔子的肯定达到政治层面：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立场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

那到底是谁说了“打倒孔家店”这句话呢？史学家发现，上世纪30年代，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回忆起他在19岁时读过胡适的《吴虞文录·序》，陈伯达说：“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这句话里，“只手”变成了“双手”，“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胡适一定想不到，自己当初为“1900后”设计的这段评价，最后被这帮孩子中的一个记住了。

再后来，这句话便成了“讹传”。新中国成立后，这句话直接进了中学历史课本，可惜一直没有人问，这到底是谁说的，靠不靠谱？